

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

李 汉 林

本文系作者近年来对城市发展问题课题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成果,其着重点在于密切注视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城市发展的动态与趋势。文章指出,近年来因国家统一集中管理、占有和分配各种资源的体制格局已经打破、并逐步松动和瓦解,单位对国家和上级单位的依赖性在不断地弱化;随着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以及人们需求满足和利益实现方式和途径的日益多样化,也使得个人及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依赖性在逐步地弱化。同时,作者对这种现象的意义与发展趋势进行客观的分析与预测。

作者:李汉林,男,195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1. 中国单位现象主要是指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行为通过组织功能多元化的特殊社会方式逐一整合到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组织即“单位”之中,从而由这种单位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左右和控制他们的行为,逐步实现人们社会行为以单位组织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现象。正是由这种独特的中国单位现象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极其独特的两极结构: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的单位组织。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一个单独的社会成员,更多地是在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来实现的。虽然,随着今天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的这种两极结构正在逐步逐步地松动,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这种基本的结构特征仍具有典型的意义。

2. 为了解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必须首先理解中国城市社区中的单位现象。对这种单位现象的分析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从单位成员分化的角度,另一个则是从单位组织分化的角度。

3. 在一个城市社区中,社会成员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单位。在学校属于学校单位,参加工作属于工作单位,退休以后不仅仍属于原工作单位,同时也隶属于街道单位,总之,从摇篮到墓地,人们离不开单位。在中国,单位不仅通过社会成员的工作使之取得一定的经济报酬,通过分配住房、公费医疗、兴办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澡堂以及为职工子女就业需要的服务公司或集体企业等等,为单位成员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服务,更多地,还给予单位成员在单位内外行为的权力(利)、社会身份以及社会政治地位。比如到别的单位去联系工作、购买飞机

* 在本文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中,曾与李路路、王奋宇、陈小雅同志以及德国波鸿大学的B. Gransow研究员和瑞士国际发展研究科学院的P. Atteslander教授进行过反复多次的讨论,他们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票、住宿乃至私人生活上的结婚登记、个人的身份公证以及办理离婚的手续，都需持单位的介绍信或通过单位进行办理。其他单位的成员则更多地根据单位介绍信中所确认的对方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来决定自己与对方行为互动的方式和态度，等等。单位通过为其成员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来满足单位成员基本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各方面的需求。一旦社会成员进入某一个工作单位，那么他的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实现以及在社会上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就有了最根本的保障。

4. 在一个城市社区的单位中，单位成员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层次上。有的处于领导地位，或者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或者代表或属于单位内实力雄厚的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因而能更多地更方便地去占有和分配单位所拥有的短缺资源，获取较多的发展机会和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诸方面的利益。有的则处于被领导地位，或者具有较低的行政级别，或者不属于单位内实力雄厚的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相比较而言，他们的资源占有量以及获得的机会和利益就少得多。正是由于在中国各种主要短缺资源的分配不是通过社会而主要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得单位社会成员之间在占有和分配短缺资源以及获取发展机会和各种利益的过程中发生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形成单位内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以及各种根据“以我为中心向外推”的差序格局。^①单位组织内部的社会关系，更多地是靠一种初级的社会规范来维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单位成员个人与单位内的某些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之间的“面子”、“交情”、“义气”以及个人道德，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一种利益和资源的结合和交换，这就使得这种社会互动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单位内部的社会分层状况，那么，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的单位现象，进而也就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

5. 在中国城市社区中，单位是有级别的。无论单位被划分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无论单位被归纳为各种不同的所有制，或者说，无论单位隶属于何种行业范围和领域，都一一被赋予了不同的行政级别。比如有部级的企业和医院，省级的公司和研究所，地市级的学校和商店，处县级的供销合作社等等。单位的级别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单位间的社会分层状况。在一般的情况下，单位的级别愈高，权力就愈大，在社会上行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就愈高，其占有的各种资源、利益和机会就愈多。

6. 观察单位分化的另一个角度是所有制。在中国城市社区中，单位总是隶属于一定的所有制。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目前中国单位的所有制形态主要有8种类型，即：全民所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全民与集体合营、全民和私人合营、集体与私人合营、中外合营、华侨或港澳工商业者经营、外资经营。^②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把单位的所有制形态简单地归纳为国营的、集体的（大集体、小集体）、私营的和个体的。和单位的行政级别一样，特别是在传统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下，单位的所有制层次愈高，其所能占有的各种资源、机会和利益就愈多，在社会上行为的地位和声誉就愈高，与其他单位进行行为互动的交易成本就愈小。

7. 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城市社区中没有独立的单位。在行政级别上，它总是隶属于一定的“上级单位”，接受“上级单位”的领导。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其单位的领导总是受“上级单位”的任免和管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和单位组织的界限是模糊的。对任何下级单位，它可能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但是，对其自身的上级单位来说，无论它本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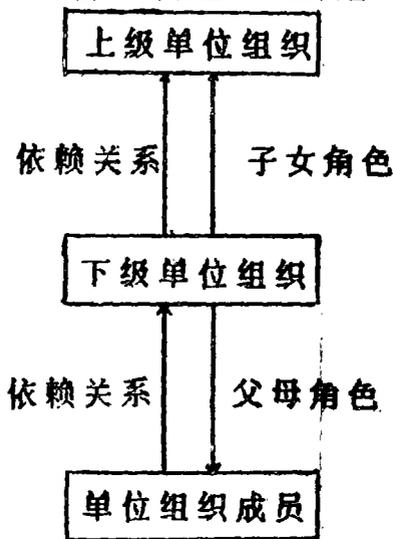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版。

身是否可以归纳为政府部门的一部分或者本身是行政管理部門，它又演变成为了下级单位。所谓“政企不分”、“党政不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单位组织界限和单位组织角色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单位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

——一方面，单位组织对下、对自己的单位成员总是力图通过整合各种社会功能于一身的方 式，尽可能地为其成员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身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功能多元化的综合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自己逐步做到“万事不求人”，把单位逐渐地封闭或半封闭起来。所谓“企业（单位）办社会”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另一方面，单位组织对上、对自己的上级单位又百般依赖，倾向于成为其上级单位的一部分。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单位自身“谁来代表，由谁负责”问题的时候，自动丧失其独立的意志和利益要求。这里，起码有两个基本条件对形成单位组织的这种行为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是单位的领导总是受“上级单位”的任免和管辖，这在中国这种“官本位”意识浓厚以及对权力看得很重的宏观社会环境中，对于那些总是期望担负更大的行政责任以及总是倾向于“趋升避降”的单位领导来说，无疑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使得单位在自身的行为过程中不敢不、也不得不服从、逢迎和执行上级单位的行为或指令。另一个是单位中所需的各种资源以及所得到的可供支配的各种利益和机会大都来自“上级单位”。以传统经济体制为例，其基本的管理方式是：按照部门（即“条条”）和地区（即“块块”）建立纵向的层层隶属的等级体制，所有企业单位分别隶属于省、市、县各级政府的主管部门单位，每一级生产领导者都只对他们的上级单位负责，国家行政单位成为了产供销、人财物的直接分配者。计划指标按条块层层分解下达，基建项目按条块安排，资金和物资按条块分配、调拨，企业单位的利润也按条块隶属关系层层上缴。换句话说，财务统收统支，资金统一无偿供应，劳动力统包统配，生产资料统一调拨，产品统购统销，生产统一指令，是这一体制的最根本特征。很显然，这种传统体制使得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的组合完全按照行政的力量，从而使资源利用和经济行为主体行政化。在这种体制下，下级单位只能被动地接受上级单位行政指令的安排，没有自己行为的自主权。一项调查表明，在传统体制中，一般国营工厂的厂长只有

图1 单位组织的双重角色



审批单价为200元—500元低值易耗品的财务机动权。像首钢、鞍钢和武钢这样的大企业经理，其权限也只有审批不能高过单位800元的产品。在60年代，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工农业产品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的60—70%，零售商品占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70%。^① 这种状况造成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下级单位更加依赖于上级单位，进而使其在上级单位父爱主义无边恩泽的保护下，在不断地与其讨价还价的撒娇过程中，成为长不大的老小孩。

8. 形成单位自身的功能多元化状况以及单位对上级单位的依赖性的原因是复杂的。

——从体制上说，为了应付险恶的国际环境以及各种势力对新生政权的挑战，完成极其艰巨的建设任务，国家必然地要把集中统一作为自身的重要使命，在战争时期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由于当时

① 卢中原：《无法回避的冲击—市场发育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页。

有很强的适应性，也自然而然地移入了正在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之中；对当时唯一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体制的效仿，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强调，再加上自身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历史发展的惯性作用，则更有力地推动了这种体制的发展。这样一来，“服从上级领导，听从上级指挥，贯彻上级意图”的上传下达的状况作为单位行为的主要取向和方式也就顺理成章地变得不可避免了。^①

——从政府行为上分析，共和国诞生之后，新政府必须具备极强的资源动员、配置和调度的能力，才能够应付和适应当时国际国内极其严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及挑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要实现政府对社会各种资源的全面占有和控制，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管制和干预，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全面包揽和满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配置和调动有限的资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点服务，才能够保证高积累低消费的工业化战略得以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实施。事实上，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如果仅仅只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资源流向，筹措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调节供求关系，那么，势必难以确保发展重点，造成物价暴涨，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因此，只有依靠超经济的强制手段，通过压低消费，实行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才能够为支撑工业化的高速度提供高额积累，也只有求助于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对紧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实行固定价格和定量配给，才能够维持一种低水平的生活消费和紧张的市场平衡。^② 这样的一种政府行为特征也就决定了单位行为过程中人们对“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强调，同时也就决定了单位作为国家和政府的派出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国家和政府去全面包揽和满足其单位成员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基本需要。这无疑地不断加剧了单位的封闭与半封闭性。

——从单位行为上观察，单位组织大包大揽、功能多元化的行为与结构特征，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传统体制社会分工的一种结果。城市社区中的社会化服务不断地萎缩，而单位中的“企业办社会”却过度的发育，尽管如此，“企业办社会”、单位功能多元化以及

对下列项目，您认为单位应在何种程度上对您负责？

项目与实际样本数	单位应该负责 (%)	单位不应该负责 (%)
退休保险 (2105)	96.6	3.4
医疗保险 (2152)	97.5	2.5
文化教育 (1962)	89.3	10.7
技术培训 (1940)	88.5	11.5
调解纠纷 (1979)	85.9	14.1
子女上学就业 (1952)	82.3	17.7
生活服务 (1964)	86.7	13.3
住 房 (2129)	91.8	8.2
文体活动 (1891)	77.7	22.3
政治思想状况 (1951)	89.6	10.4
计划生育 (1808)	79.3	20.7
党团组织生活 (1822)	87.4	12.6
离 婚 (1657)	45.1	54.9
婚姻恋爱 (1703)	37.2	62.8

样本总数=2348

① 参见：李汉林等：《寻求新的协调》测绘出版社，1988年，第238—284页。

② 参见：姜小星《社会政策发展报告》，载：陆学艺、李培林：《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页；卢中原：1992年，第6页。

为其单位成员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却没有作为一种激励手段被人们所认识，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理所当然”被人们所接受。一项城市居民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单位成员认为，单位为他们提供的各项服务是“应该”的。如果把以上表格中单位所承担的14项责任合起来作为一个新的变量，然后和年龄、工资、教育程度和性别四个变量进行因素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具有相当高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9、0.64、-0.53、-0.57。^①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社区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和质量都很低，所以，“企业办社会”的水平和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并在事实上成为了提高单位成员的生活水平，满足他们日益增长基本需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单位领导在其行为过程中“趋升避降”的行为取向和行为动机以及单位成员和上级单位对单位领导政绩的评价和考核，也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与“企业办社会”的水平和质量联系在一起，这就在客观上强化了“企业办社会”，强化了单位功能多元化的行为意识。一项对厦门特区中的36位企业厂长的调查结果表明，67%的厂长认为，企业为职工提供各种生活服务是企业单位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冗员，但72%的厂长仍然认为企业单位不应加以裁减。^②由于国家和政府对资源的高度集中和垄断，也使得单位只能从其隶属的上级单位打交道的过程中才可以获得他们包括“企业办社会”在内所需要的各种短缺资源，这就使得他们对上级单位的依赖性和顺从感在这种行为交换和行为互动过程中得以不断地强化。

——从中国文化传统上思考，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以及相应的家族文化，家国一体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方式，都对现代单位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或继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单位组织行为中的大包大揽、功能多元化的现象中寻觅到中国传统家族组织中的大包大揽、功能多元化的痕迹。同样，也可以从单位成员对单位的依赖中观察到传统家族组织中家族成员对家族全面依赖的影子。

9. 正是在单位对上级单位、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高度依赖性以及单位功能多元化等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城市社区对其社会成员高效率的整合和控制。

二

10. 对城市社区整合与控制机制的分析，可以沿着国家政府——单位组织——单位组织成员的思路逐步展开。

11. 中国城市社区中的整合与控制，说到底主要是指社区政府代表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和意志，根据国家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影响、制约和整合城市中社会成员行为的社会过程和机制。但是在事实上，城市社区的政府从来没有直接地作用和影响其城市社会成员的行为，而往往总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单位来实现其整合和控制的。

12.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单位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对其上级单位组织具有极强的依赖性。每一个上级单位都根据自己所能够占有、分配和控制的社会资源以及对下级单位的任免权力把其所管辖的下级单位牢牢地捆在自己身上，使其成为自身的附属物。而每一个上级单位，无论是属于“条条”（即中央部门）还是“块块”（即地方行政区域），

^① 这项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城乡室城市发展课题组于1987年组织实施。问卷以随机方式对全国30个城市发放3000份，回收有效问卷2348份，回收率78%。

^② 李汉林等：《寻求新的协调》，测绘出版社，1988年，第323—327页。

都是国家和政府的派出机构，都必须要在“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原则下，保证国家意志和中央指令的贯彻。这就为在处理国家政府和各级单位组织的关系上，国家和政府始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奠定了较坚实的组织和结构基础。

13.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同时还知道，城市社区的每一个单位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一个功能多元化的综合体。国家通过单位为个人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满足个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需求。单位在提供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同时给予了单位成员在单位内外行为的身份、权力(利)和地位。对于每一个单位成员来说，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必须全方位地依赖于单位才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进而同时也取得在社会上行为的身份、地位和资格。所谓城市中的“盲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是指那些在特定城市社区中没有单位和户口的个人。正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没有单位的身份和地位，所以他们没有在那里行为的权利，他们的行为被斥之为“非法”，由公安机关遣返回原社区和原单位，自然也就成为题中之意了。

14.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在任何社会互动的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都可能有优势和劣势的不同情境的区分，进而形成一种支配的关系。这就是说，居优势地位的组织、群体和社会成员具有影响、决定和控制处于劣势地位的组织、群体和社会成员的机会和能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支配与被支配，依赖与被依赖的社会互动关系形式，特别是当一些组织、群体和社会成员掌握和占有较多短缺社会资源的时候，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向外发散的要求，以期达到扩展自己的权力、利益和影响力的目的。^①

15. 从这一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和单位的关系上，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社会各种资源，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形成对单位绝对领导和支配的关系；在单位和单位成员的关系上，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进而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形成对单位成员的支配关系。换句话说，单位功能多元化的一个直接和突出的社会后果是在极大的程度上强化了单位成员对其单位的全面依赖性。正是从中国的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国家通过城市社区政府对社会成员按照国家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进行整合和控制，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直接作用于社会成员，而仅仅只需要通过控制其隶属的单位就能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这就是说，在城市社区中，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整合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而单位在单位成员中贯彻国家整合和控制的意志则主要是基于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赖性、通过单位自身的功能多元化的过程来实现的。因为，在任何依赖的社会情境中，人们只有通过服从作为代价才能换取资源，进而获得行为的身份、自由和权力。在国家和单位的关系上，对单位是如此；在单位和单位成员的关系上，对单位成员也是如此。

16.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改革的过程中，为什么对企业单位的“让利放权”总是没有达到所设想的预期，却偏偏总是使得“企业办社会”的趋势在“让利放权”的喧哗声中得以加强。^② 由此，我们同样不难理解，为什么一项旨在强化各种类型单位组织专业功能的精兵简

① Georg Simmel, 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ueber die Form der Vergesellschaftung, Berlin, 1968, P. 109-149.

② 一项调查表明，1988年在城镇居民从单位中获取的全部货币收入中，工资外收入（这包括各种名目的奖金、津贴补贴、实物收入等）已占到40%。如果扣除银行渠道能够反映的部分外，由单位发放的隐蔽性工资外收入约为700亿元，而在银行能够反映的部分中，估计由单位发放个人的劳保补贴性收入不低于600亿元。两项合计约为1300亿元，相当于工资总额的40%左右。参看：黄苇町：《中国的隐形经济》，中国商业出版社，1992年，第193页。

政的机构改革措施却总是陷入了减了又增，增了又减，愈减愈增的恶性循环之中，形成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①这主要是因为，这两项旨在改变单位行为的改革措施却在有意或无意之中触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结构，牵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整合和控制机制。当在宏观上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整合与控制机制重组的条件还不具备和还不成熟的时候，简单的改革措施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步履艰难的困境。而恰恰在这个层次上理解、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单位现象，对于我们在宏观上把握中国的结构变迁和中国城市社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整合与控制机制，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深远意义。

三

17.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再加上经济特区和广东沿海一带区域经济社会高速度发展的现实，使我们日益明显地感觉到，中国社会的那种由高度集中的国家与政府和相对分散及相对封闭的单位组织所构成的两极结构正在逐步逐步地松动，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结构性要素也正在逐步逐步地产生，并日益发育成熟起来。这具体地表现在：

——由国家集中控制和统一分配资源的状况在逐步改变。根据1986年的统计，就全国范围而言，国家计委管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已从1984年的120种减到60多种；国家统配物资已从1984年规定的256种减少到23种；建设资金由政府渠道开支的已从1978年的76.6%下降到1986年的31.6%，由银行渠道解决的已从23.4%上升到68.4%；1986年工农业产品的商品率已达63.9%，主要生产资料由企业自销的比重上升，1986年钢材自销达32%，水泥48%，煤炭25%。在1986年，各类商品已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②而到了1992年底，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比重已经由5年前的50%左右扩大到80%左右。^③作为改革前沿的经济特区和广东沿海一带，这方面的步伐就迈得更大。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战略以后，完全可以有理由预计，这种由国家集中控制和统一分配资源的状况会有更大程度和范围上的改观。

——城市中的社会化服务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城市中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748.2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3716亿元；1978年，全国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共125.5万个，从业不员607.8万人，到1990年，分别发展为1186万个，从业人员达2909.4万人。1978年每万人口中有服务网点数为13.5个，而在1990年已发展到103.7个。^④住宅商品化、医疗、退休养老、失业救济等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不断地发育、发展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也空前地活跃起来，据1989年统计，全国共有3000多所劳务市场，介绍城镇待业人员达180多万人；就业培训中心1800多所，每年可为2000多万待业人员组织培训；全国已建立2700多个社会保险机构，为10万多待业职工提供了失业救济；此外，劳动服务公司的24万个生产经营网点还提供了八百多万个就业岗位。^⑤

① 一项统计表明，1990年，全国机关单位数比1984年增加5.5万个，平均每年增加0.9万个。1990年，全国各地各级机关共超编50万人。全国干部队伍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增长，目前总数已接近3400万人。国家干部队伍每年经费达1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参看：苏娅、贾鲁生：《白猫、黑猫——中国改革现状透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86页。

② 《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7月6日。

③ 《经济日报》，1993年3月16日。

④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

⑤ 卢中原：1992年，第28页。

——随着社会化服务的长足发展，伴之而来的是人们需求满足日益趋于多样化。人们不再满足于实现其基本的物质要求，而是不断地追求需求在更高层次上的满足，所谓新四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在中国城市社区中的普及，仅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其中大城市的普及率已达80%—90%。而且也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相当多的城市居民还完成了从黑白电视机、单缸洗衣机、单门电冰箱向大屏幕彩电、双门大冰箱、双缸式或全自动洗衣机、高级组合音响等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更新换代过程。国产摩托车在国内市场上每年的消费量已达1万辆以上，私人安装空调1991年比上一年增长5倍，每户耗资数千元的居民室内装饰，已成为由单位分配到新房人们的带有普遍性的选择。^①

18.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由国家统一集中管理、占有和分配各种资源的体制格局已经打破、并逐步松动和瓦解，单位对国家和上级单位的依赖性在不断地弱化；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以及人们需求满足和利益实现方式和途径的日益多样化，也使得个人及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依赖性在逐步地弱化。一些单位在逐步地从国家和上级单位的控制之下游离出来，形成“没有上级的单位”，比较典型的是一些私营企业、中外合资的公司以及一些股份制企业集团；一些个人及单位成员也逐步地从对单位组织的强烈依赖中解脱出来，产生了一些“没有单位的个人”，这主要反映在个体劳动者或从事第二职业、停薪留职、另谋出路的现象大量涌现。^② 尽管在严格的意义上，他们还没有彻底脱离开上级单位或单位组织脐带，他们和上级单位或单位组织总是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比如，他们还必须保留一些行政关系，挂靠到某些集体、国营或行政单位；就是那些所谓完全没有“单位”的个体劳动者也还必须与居住或隶属的街道单位发生这样的或那样的联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严格意义上的单位和单位成员了，他们对上级单位和单位组织的依赖性已大大地削弱了。

19. 按照社会学的理论，当一个社会系统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不再仅仅依赖于某一个环境系统，而同时依赖于多个环境系统，与多个环境系统发生社会互动关系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系统就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支配自己的行为，进而从依赖的关系和情境中解脱出来，获得自身行为的自主权和较大的自由度。^③ 如果我们据此来思考在中国城市社区中产生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不断弱化的这两个基本事实的原因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这并不是因为依赖关系的消失，而主要是因为人们对环境的依赖由一元变成了多元。正是在这种多元依赖的过程中，人们才获得了自身行为的自主权和较大的自由度。

20. 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依赖性的弱化以及单位和个人在其行为过程中自由度的增强，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尤其是对中国城市社区中的整合与控制机制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这起码预示着，中国城市社区整合与控制机制得以运行的重要基础——即单位对国家和上级单位的全面依赖，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全面依赖——已经开始动摇；国家和政府已经逐渐地不再可能像以前那样（起码目前在一些发展较快的局部地区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只通过单位就能够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和整合了。这样一来，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必然会因此而开始松动。尽管这种松动还没有从根本上导致中国

① 黄苇町：《中国的隐形经济》，中国商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187页

② 王颖，折晓叶，孙炳耀：《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259—262页。

③ N. Luhman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Opladen. 1971. P. 154ff.

社会的这种基本结构的完全解体，因为单位成员对单位基本需求满足的依赖以及单位对国家在资源分配上的依赖虽然开始弱化，但在全国的范围内，单位成员仍然需要通过单位来确认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在社会上行为的合法性；在单位体制外的一些社会组织中，比如一些民办的公司和私营企业，人们社会行为及行为互动所应承担的风险仍远大于在单位体制内，其所获得的行为效益仍远小于单位体制内；国家对单位领导管辖和任免的权力和对金融等关键行业的垄断性管理以及在投资和信贷上对国营及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倾斜都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对单位行为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不管怎样，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趋势已经使人们日益明显地感觉到，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城市社区整合与控制机制的重组，中国社会的变迁，呼唤着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分化和重组。

21. 必须看到，在一个社会急剧变迁、新旧体制转换的非常时期，许多传统的东西虽然在制度上已经破裂，但许多崭新的东西却不可能马上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并迅速地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确立起来。特别是当双重体制带来双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上的摩擦、冲突的时候，更是会造成人们价值取向上的混乱，进生出疏离感、颓废感和无规范感。失范正是这种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22. 如何适应这种急剧的社会变迁，重组城市社区中的整合和控制机制，把失范所带来的负效应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震荡”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促进一个城市社区的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摆在每一个社区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尤其是那些改革发展比较迅速、比较深入的经济特区和广东沿海一带区域，完成这一任务更具有迫切的意义。

——要实现重组城市社区的整合和控制机制，首先是要顺应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进一步加强城市中社会化服务的建设，使单位中的一些非专业功能逐步地从单位中分化出来，至少使“企业办社会”在原来的规模、范围、形式和内容上逐步萎缩，使单位行为中的专业目标逐渐占主导地位，政治目标或其他的非专业目标逐渐退化，使在单位中由于各种原因仍还保留着的非专业化功能以及为单位成员所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不再作为“应该的给予”，而是真正作为一种激励的手段与方式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结束原有的整合和控制机制的运行，减少双重机制的摩擦和冲突。

——其次，在一些非专业化功能逐步从单位中分化出来的同时，尽快地使对单位成员的单位管理转变为社会管理，使他们的单位身份变成社会身份，单位规范转变为社会规范，弱化他们的单位意识，与此同时，加强他们的社会意识，真正使他们实现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飞跃和转变。

——最后，社区政府的整合与控制行为逐步间接化。这主要是指社区政府不再对单位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主要是对单位行为互动赖以进行的环境和秩序负责。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政策、法律和法规是一种指导人们社会行为的行为规范，它一方面给行为者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约束，另一方面也为人们的行为建立起一种行为秩序，进而使人们的行为有了一定的规则、取向，促使人们自觉地防止行为的“犯规”。在处理城市社区政府与单位组织关系问题上的基本出发点，也应该放在建立和不断完善保障这种社会互动关系的社会秩序上。据此，社区政府对单位行为的影响，应主要局限在政策投入、经济与社会立法与规划、经济杠杆和伦理调节五个方面，进而从总体上把握和影响单位行为。这同时还意味着，要尽快弥补对社会成员的单位管理弱化后所形成的真空，建立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倡导新的伦理道德，从而以法律控制与伦理调节交互作用的方式实现城市社区整合机制的重组。

23. 这里,在结束本文对中国单位现象和中国城市社区整合机制问题初步讨论的时候,我们还指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就是在那些号称“中国第一村”的地方,比如像天津的大邱庄、河南的刘庄、江苏的华西村以及广东深圳的万丰村,都是目前中国小型社区中经济实力极强、经济发展极其迅速、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高的地方。恰恰在这些地方,从“摇篮到墓地”的单位管理方式同时也得到了充分的发育,以村为基础的单位整合与控制的效率极高,社区成员对其单位的认同感和依赖性极强,“开除村籍”对于每一个村民来说都有着极大的威慑力。我们指出这一点只是想说明,中国单位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决不完全是某一个政权的产物,更多的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中国传统的产物。中国的单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社会的变迁逐步改变其客观存在,但是决不会很快地在这块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和神圣的土地上消失。认真地研究这种单位现象,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中国的社会,是有益的。

参考资料及书目:

- ① Bian, Yanjie, *Workunit Structure and Status Attainment*, Diss. Suny at Albany, 1990.
- ② Cell, C. O., *Revolution at Work*, New York, 1977.
- ③ Gransow, B., *Soziale Klassen und Schichten in der VR China*, Muenchen, 1983.
- ④ Hebel, J., “Der Betrieb als kleine Gesellschaft” in *Sozial* Welt*, Nr. 2, 1990.
- ⑤ Li Hanlin, *Die Grundstruktur der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vom traditionellen Klansystem zur modernen Danwei-Organisation*, Opladen 1991.
- ⑥ Walder, A.G., *Communist and New-Traditionalism*, Berkeley, 1986.
- ⑦ Weggel, O., *China*, Muenchen, 1987.
- ⑧ Whyte, M. K. and William, L. P.,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1984
- ⑨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 ⑩ 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⑪ 于显洋:《单位意识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 ⑫ 谭深:《城市“单位保障”的形成及特点》,《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 ⑬ 北大“社会分化”课题组:《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责任编辑:王 颌